

· 语言学研究 ·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在内地与香港语言对比研究中,“港式中文”受关注的程度很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是,一些人对港式中文的基础问题认识还不够清晰,甚至是比较模糊。港式中文的“底本”是早期现代汉语,即上世纪前半叶的“国语”,二者无论在词汇还是语法上都有相当高的相似性。明确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这种关系,既有助于汉语/华语历史的研究,又有助于纠正某些不正确的认识;既可以由港式中文反观早期现代汉语,还可以推而广之,用之于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的研究。

关键词:港式中文;早期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史

中图分类号: H178; H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12)01-0049-05

“港式中文”是人们近年来研究香港书面语言及其与内地差异时经常用到的一个称名,但是人们对它的内涵及所指对象等的认识却并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比如有人说“所谓港式中文是以粤方言为基本框架,加上若干惯用的书面语字句及英语单词混杂而成”^[1],而有人则把它定位为“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汉语书面语”,定义为“以标准中文为主体,带有部分文言色彩,并且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在词汇系统、词义理解、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区普遍使用的汉语书面语。”^{[2]6}

我们认为,后一定位和定义更为准确、客观,并且是迄今为止对港式中文最为全面、完整的表述。但是,这一定义仍有不足,这就是对“标准中文”尚未作准确的界定,由此可能会造成认识上的模糊以及具体操作中的某些问题。

港式中文“实际上形成于 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并且在 90 年代开始趋于成熟”^{[2]13},而作为它的“底本”的标准中文,则是 20 世纪上半叶的“国语”,亦即我们所说的早期现代汉语,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 关于早期现代汉语

“早期现代汉语”在一些学术论著中偶能见到,人们一般用它来指早期阶段的现代汉语,但是没有特别明确的时间界限。在我们提出的“现代汉语史”中,按现代汉语的形成以及发展变化过程,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和 1978 年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从“五四”时期到 1949 年为第一阶段,我们称之为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3],

有时也用“早/初期现代汉语”来指称这一阶段。

关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般状况,现在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主要散见于相关的论著中,比较成系统的研究,较早的一部著作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主要讨论了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晚些时候的有刁晏斌《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公司 1998 年初版,辽海出版社 2007 年修订再版),如书名所示,本书只涉及语法一个方面。此外,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对本阶段诸多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修辞等现象也进行了较多的考察和分析。

我们对早期现代汉语的认识,就是通过上述论著及研究而获得的,而这些也是下文我们与港式中文进行比较的基础。

此期语言及其使用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纷纭复杂、陌生化程度高,而这当然与它的“早期性”密切相关。上述特点在早期现代汉语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得比较充分。就以语法来说,比如句子成分的位置与后来有不少差异,像状语就经常与其所修饰的中心语隔离,显性关系与隐性关系不一致的情况比后来更加普遍;某些句子成分的构成也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比如能做述语的,就有及物动词以及部分不及物动词、述宾词组、形容词以至于名词等,并且它们还都比较常见。述语的情况如此,其他各成分大抵也是这样。在句子形式方面,各种“欧化句”大量使用,“古句”与“准古句”以及“非今非古句”大量存在,^{[4]34-35}这些都是构成此期语法复杂

收稿日期:2011-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四地若干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10BY023)

作者简介:刁晏斌(1959-),男,山东烟台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共时状况及时演变的研究。

性的具体表现。

在本文以下的表述中,早期以外,即第二、三阶段的现代汉语,我们姑且以“内地汉语”称之,以与早期现代汉语及港式中文相区别。

二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

我们对港式中文总体面貌和具体特点的了解,主要依据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编著,香港教育图书出版公司2006出版的专著《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以下简称《港》)。本书主要从词语、句法和语用三个方面,比较全面、细致地罗列和讨论了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诸多差异。除此之外,部分语言事实还来自作者自己的感知和积累。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接触过一些香港地区的各类语料,也有多次赴港从事学术和教学等活动的经历,因此对香港的语言及语言使用情况并不陌生。

对《港》中列出的诸多词汇、语法现象(也就是与内地汉语不同的现象),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并且最终都能在各类早期现代汉语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用例。这就说明,二者之间确实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关于这一点,汪惠迪有以下一段解释和说明:“在改革开放前的大约30年间,境外华人社区基本上是各自沿着中文固有的轨迹发展的,因而在字、词、句的使用上显得十分传统。表现之一是,在内地,50年代初就退出人们语用生活的词语,港澳台地区至今还在使用;在内地,已经退出规范汉语甚至已被认为是病句的某些格式,港澳台地区也还在使用。‘港式中文’中一些语法现象,与内地相比,显得‘独特’,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5]

本部分中,我们就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来举例说明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上述一致性,港式中文的例子主要从《港》中选取。

(一) 词汇方面

构成港式中文词汇方面特色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早期现代汉语中已经存在和使用而在内地汉语中却已消失或趋于消失的词语,二是粤语词语,三是后起词语(相对于早期现代汉语而言,包括外来词语以及其他新生词语等)。三者之中,可以直接证明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一致性的,当然首先是第一类了,所以我们先就这类词语进行考察和说明。

早期现代汉语中已经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有一些音译外来词,内地汉语逐渐改用意译,而港式中文则依旧保留原有的音译形式。这样的词有一大批,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维他命(维生素)、摩登(时髦)、莱塞(激光)、开麦拉(摄影机)、菲林(胶卷)、卡通(动画)”等。

早期现代汉语中已经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还有一些同素倒序词。语素顺序不固定是词汇“早期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所以此期比较多见。^{[6]134-136}后来的情况是,内地汉语完全或基本上选择了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另一个,由此形成差异。比如表示“固有的品质或性质”义,早期有“素

质”和“质素”两种形式,以下各举一例:

(1) 罗马在鼎盛时代,文艺的发达登峰造极,书牒的素质也因之提高。(朱光潜《艺文杂谈·欧洲书牒示例》)

(2) 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

后来内地汉语选择的是前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后一个。

以下港式中文里的词都属于此类:找寻、替代、妒忌、宵夜、齐整、爽直、紧要、菜蔬、私隐、经已、取录、怪责、劳烦、帖服、配搭、挤拥、秘奥、人客。

除上述两类词外,还有大量共用的常用词,也反映了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

《港》的某些考察就涉及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该书谈到,港式中文“开幕”的开始义搭配对象远多于标准中文,店铺、场馆的开业在香港都可以称之为“开幕”,而早在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年)中,就有“生活开幕”的形式;香港20世纪20年代的《工商日报》中,也有“书院开幕”、“店铺开幕”的搭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沿用了‘开幕’过去的用法,内地则缩小了使用范围,所以产生了差异。”^{[2]75-76}

这种沿用早期现代汉语中意义和用法的港式中文词语有很多,再如“认真、意图、发达、工友、主持人、裁判、大班、行礼、检讨、揭发、身家、戏院”等。

(二) 语法方面

相对于词汇来说,港式中文在语法方面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更高,这主要是因为语法的稳固性比词汇更强,变化相对较小,因而对语言发展的反映不像词汇那样迅速而又突出。

笔者曾经发表过题为“从历时的角度看香港汉语书面语的语法特点”的论文,针对《中国语文》2006年第2期刊登的《香港汉语书面语的语法特点》一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其实就是谈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语法一致性的。后者从关联词语的使用(包括标准汉语中成对出现的关联词语的单独出现和超常呼应)、零形回指用法对标准汉语中存在的制约条件的突破和指称标记的使用(主要包括指称标记的缺省和用法扩大)这三个方面讨论了港式中文的语法特点,结论是上述特点均来自英语的影响以及港人的创新。笔者则一一对应地列出了见于早期现代汉语的相同用例,以证明我们的结论:香港书面汉语这些语法上的特点,源自对传统“国语”的继承,而不是对“标准汉语”(即标准普通话)的迁移;上述形式可能与英语等的影响有关,但未必是香港人的发明创造。^[7]

比如以下一组关联词语“即使……也”中“也”不出现的用例(例4为笔者例,略掉部分用括号标明):

(3) 田北俊认为,即使暂停卖地一段时间,日后的楼价(也)不会大幅上升,因为其间仍有补地

价的楼盘推出。(《明报》2002年9月27日,A17版)

(4)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也)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港》用了两编的篇幅讨论港式中文语法方面的特点,所涉及的大多数现象,都能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找到相同的用例,以下词法、句法各举二例。

指示代词“这”在港式中文里经常不借助数词或量词而直接与名词组合,如“这女士、这集团、这改变”等,而这样的形式正是早期现代汉语“这”的常态用法之一,例如:

(5)这时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一线曙光,已经是摇摇欲灭的了。(《冰心文集》第一卷)

港式中文里,连词“和”经常连接两个动词性短语,如“买楼和卖楼”、“只拍电影和拍广告”等,而这也是早期现代汉语“和”的常见用法,例如:

(6)他自己底父亲就在他家作活和赶叫驴。
(许地山《春桃》)

港式中文里,被动句较少使用“被”字,而是代之以“遭”,这也是沿用了早期现代汉语的常见形式,例如:

(7)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鲁迅《野草》题辞)

港式中文表示前项强于后项的差比句,经常采用“N1形容词+过N2”的形式,如“港环保柴油贵过日本”等,早期现代汉语中,同样也有这样的形式:

(8)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总之,在现代汉语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只有第一阶段即早期现代汉语与港式中文相似程度最高,因而关系最为密切,而究其原因,则是如前所述,前者是后者的“底本”。

三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的差异性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一致性反映了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二者之间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由此则反映了前者在后者基础上的发展变化。语言总是要发展变化的,并且时时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而香港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自然使得此地通行的汉语书面语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并明确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继承关系,对于前者在后者基础上的发展变化不作进一步的展开,这里只是简单地结合港式中文的特点(其实也就是形式或用法的主要来源及产生原因),来对二者之间的差异略作说明。

如前所述,港式中文形成于20世纪70到80年代,90年代趋于成熟,在此期间及以后产生的形式和用法,自然是早期现代汉语所没有的;就是再往前推,一直推到早期现代汉语阶段,内地与香港地区的书面汉语也还是会有一定差异

的,而这些差异主要就是由香港语言的特点决定的。

港式中文的特点之一是有浓厚的粤方言色彩,主要表现为较多地使用粤语的常用词语,同时也有一些掺杂或结合粤语语法成分的现象。

前者如郑定欧《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收了很多由粤语而进入港式中文的词语,比如“私家”,义为“私人拥有的”,由此构成的词语有“私家车、私家路、私家地方、私家侦探”等。《港》谈到,“纸”在粤语中经常特指纸币,由此产生了“港纸(港币)、散纸(零钱)、阴司纸(纸钱)”等;此外,“纸”还用于指纸质的单据或证明,由此又有“落货纸(卸货单)、出水纸(提货单)、出生纸(出生证明)、医生纸(病假条)、宣誓纸(证明文件)、沙纸(证书)”等词语。^{[2]51}以上是成“族”的词语,至于直接用于港式中文的单个粤语词语,那就更多了。

后者如《香港粤语词典》收“试过”一词,词性标注为副词,释义为“表示从前有过某种行为或情况,(多用于否定式)”,举例有“香港从来未试过有地震”等。《港》也谈到“曾经”义的“试过”,所举用例如“在正常情况下,阿富汗中部和北部的冬季会在十一月底降临,但也试过提早到来”,书中说“这显然也是受到粤语的影响”^{[2]29}。

另外,“他特别多话题”、“书展太多人”这样的“特别多”、“太多”等直接带宾语的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常见的粤语用法。^{[2]184}

港式中文特点之二是中英混杂现象比较普遍,而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成为语言生活的一种习惯”^{[2]358},有人称这样的形式为“鸡尾语言”,称这样的文体为“鸡尾文体”。^[8]

在汉字串中夹杂英文词语及其变化形式(比如截取一部分)的早已屡见不鲜了,以下只举两个句法方面的例子:

(9)相信银行调高按息,楼价泡沫将会爆破,
现在是时候沽货了。(《新报》2011年3月15日)

(10)汲取日本核爆教训是时候检讨核政策。
(《成报》2011年3月16日)

《港》中认为,这明显可以看出是仿照英语“it is time to do something”这样的句型造出来的汉语句子。^{[2]307}

港式中文特点之三是保留很多文言成分,途径有二:一是沿用早期现代汉语,二是使用粤方言中保留的文言词语。前者体现了它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后者则可以归因于上述第一个特点。这两个方面前边均已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四 明确二者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如前所述,本文所说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前者对后者的继承,所以本部分我们也主要立足于此来讨论明确这一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一) 有助于汉语/华语历史的研究

姚德怀指出,研究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异同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便是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地区的汉语/华

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最终又怎样达到各地区当代华语的现况。”^[9]这里实际上是指有两种“史”的研究值得重视:一种是近百年来整个汉语/华语的历史,另一种是前一种史的架构下各华语地区汉语/华语的历史。

到目前为止,港式中文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共时平面的概念,而建立它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联系,则是把这一研究引向历时平面,引向上述的第二种“史”,同时自然也可以纳入前一种“史”之中。

从史的角度说,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无疑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and 把握港式中文的来龙去脉,从而更加客观地描写它的真实面貌。

(二) 有助于纠正某些不正确的认识

当今语言观及语言研究的重要进步之一,就是共时与历时的真正结合,但是这一点在两岸四地语言差异及其融合的研究中似乎体现得还不够充分,而有一些研究所得的结论不够准确、正确,有时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前边简单叙述的拙作《从历时的角度看香港汉语书面语的语法特点》所谈内容即为一例,以下再就“高买”一词举例说明。

《全球华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收“高买”,释义为“[动]指在商店偷窃商品”,所举用例为“本商店将严拿~”“他在超市~被发现”,在“使用地区”项下标明“港澳”。《港》说“有时候,如果不太了解香港社会的具体情况,对这些社区词就有可能发生误解。例如‘高买’,有人以为就是‘三只手’的小偷,其实不然。这是专门指在商店里偷商品的小偷,因为如果抓住就要罚几倍于商品价格的钱款,所以美其名为‘高(价购)买’。而一般的‘小偷’则叫‘小手’,以示区别。”^{[2]44}

想起了20年前读过、至今印象依然深刻的一部中篇小说《高买》,作者是天津作家林希,刊于《中国作家》1991年第1期。小说多次获奖,曾改编为评书,还与作者的另外两部小说《丑末寅初》《相士无非子》一起联合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草根王》,曾经热播一时。

小说中有以下两段关于“高买”的文字: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偷东西的不上梁了,于是便有了更高雅的称谓:高买。

真是一个雅号,这“高买”二字简直就是中华古老文化的结晶,洋人无论如何也组合不出这个词来。洋文讲词根、词尾,高就是高,买就是买,是高高高兴兴地买,还是高高雅雅地买,一定要含义确切。中国文字则不然,高买就是高买,既不是高兴地买,也不是高雅地买,是买东西不付款,不掏钱。买东西不给钱,高不高?高!真是高,这就叫高买。

作家当然不是语言学家(其实作家林希还做了不少整理天津方言的工作),而文学作品也不是语言学著作,所以或许我们还不能仅凭上述两段话就得出什么结论来。

然而,如果能够找到工具书以及实际用例的支持,那情况就不同了。曲彦斌《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收有此词,共列二义,其一为“清末以来京津

等地江湖诸行指专门偷窃珠宝店、绸缎店的小偷”,其二是“旧时北方偷窃团伙指伪装富豪进商店乘机盗窃”。另唐钰明曾引徐世荣《谈“高买”》(《香港《词库建设通讯》1993年总第1期)说“‘高买’一词,在三十年代(我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北京的报端常见,但口头不太说”,唐氏最终的结论是,“隐语通用化并非个别现象,‘高买’成为京、港方言词,也不过是这股语汇支流中的一片小浪花而已”^[10]。

结合历史以及现实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港式中文里“高买”一词有着与很多由早期现代汉语乃至古代、近代汉语继承而来的词语相同的发展路径,它不是一个“新词”,而是一个“旧词”。此词的发展过程大致是由京津地区隐语进而实现通用化,然后保留、沿用,在港式中文里。

第二,结合上引词典释义以及现实的用例,此词并非只有动词一个词性,而应当是动、名兼类(前引用例中“严拿高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汉语有“动名同形”的习惯,某些词既可指动作行为,又指有此动作行为的人,古代的如“医、屠”,现代的如“导游、策划”,“高买”也是如此。

第三,此词在当代汉语中也并非完全绝迹,特别是随着电视连续剧《草根王》的热播,也不时有人用到或提到此词,甚至还出现了“高买行(hang)”这样的复合形式,只是似乎是作为“历史词”使用的。

(三) 可以由港式中文反观早期现代汉语

既然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有明确的继承关系(如果用“语言化石”的比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妨把前者看做后者的“化石”),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由前者反观后者,从而又找到另一个了解和认识早期现代汉语面貌与样态的途径,这当然有利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

前边第二部分所列举的一致性用例,都可以支持这一论断,具体说来,大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可以作为线索或向导,就某一现象入手,追寻它们在早期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及一般特点等,比如前边对“高买”的考察,就是一例;

第二,可以作为支持或证明早期某一或某些现象存在或具有某一特点的依据之一;

第三,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某些方面的比较,从而更好地发掘其在早期使用中的某些特点和规律。

我们经常强调,进行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有更多的“亲历性”语料可以利用,如果加上港式中文,这一语料范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在我们设计的现代汉语史研究方法中,有文献调查法、工具书查考法等,目的是借由过往编纂出版的各类文献来了解较早时期现代汉语中某些有时代特色的形式和用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看来,不妨再加一个“港式中文反观法”,相信也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四) 可以推而广之,用之于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的研究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人们经常把港澳两地或台港澳/

港澳台三地看做一方,来与内地汉语进行整体对比,考察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与融合。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述两地或三地书面语言的高度一致性。对于造成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已论及,但多集中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面,比如汪惠迪说“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港澳台地区自成一个语用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内地跟这些地区的社会制度不同,各自的价值观、语用观也不同;二是内地同胞跟港澳台同胞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不来往。因此,虽然大家都说汉语,写汉字,但是语言文字碰撞的机会少之又少,交融与吸收也就微乎其微。”^[5]

至于语言自身方面的原因,似乎讨论得还不够充分,其实,造成两地或三地语言一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大致都与早期现代汉语有相同的继承关系。澳门与香港联系最为紧密,语言的相似度最高,在这方面的一致性也最强;至于台湾“国语”的这一特点,也是同样明显的。有人说:“台湾所谓的国语,是在四十年代北方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与内地便失去了联系,因而台湾国语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11]还有人说,“所有台湾语文上的特色,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饶富古意’,台湾呈现的是中国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语文现象,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仍旧贯’。”^[12]这样的叙述是比较客观的,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作过一些论证。^[13]

所以,无论研究港式中文、“葡式中文”,还是台湾“国语”,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增加早期现代汉语这一视角,从而对一些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和分析,甚至于纠正某些不太准确或正确的看法。就后者来说,比如有人文章讨论了海峡两岸“因词义演变产生同形异义现象”,其中的第一点是“因词义扩大产生同形异义现象”,第一项是“内地不变,台湾扩大”,所举例词有几十个^[14],其中有一些就是台湾沿用早期现代汉语而内地义有所转或缩小了范围。比如“开幕”前边已作说明,其他的再如“商场、摆平、生理、黄牛”

等,大致也都如此。

参考文献:

- [1]黄坤尧.论港式中文[C]//程祥徽,林佐瀚.语体与文体.澳门:澳门语言学会、澳门写作学会,2000.
- [2]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M].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
- [3]刁晏斌.论现代汉语史[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6):69-73.
- [4]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5]汪惠迪.“港式中文”中某些语法现象值得深入研究[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7(总87):5.
- [6]刁晏斌.现代汉语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7]刁晏斌.从历时的角度看香港汉语书面语的语法特点[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7(总87):1-5.
- [8]陈耀南.歪风卑格·中英夹杂——鸡尾文体的检讨[C]//程祥徽,黎运汉.语言风格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9]姚德怀.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的异同值得研究[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7(总87):6-7.
- [10]唐钰明.“高买”探源[J].语文建设,1994(1):2-4.
- [11]周志远.台湾“国语”词汇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的对比及几个有关问题[J].玉溪师专学报,1992(3):8-11.
- [12]周质平.台湾语文发展的歧路是“母语化”,还是“孤岛化”?[J].读书,2004(2):41-46.
- [13]刁晏斌.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 [14]苏金智.海峡两岸同形异义词研究[J].中国语文,1995(2):107-117.

“Hong Kong – style Chinese” and Early Modern Chinese

DIAO Yan – b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 i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Hong Kong – style Chinese” has held great attention and henc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in abundance. However, some people’s view on Hong Kong Chinese is not clear, even more ambiguous. The original of Hong Kong – style Chinese is early modern Chinese, namely, the “Mandarin” in first half of last century, which has very high similarity in both vocabulary and grammar.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 style Chinese and early modern Chinese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the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but also to the correction of some incorrect understandings; Besides, it can both reflect early modern Chinese through Hong Kong – style Chinese and give extended application for the study about language differences and fusion in the four pla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Key words: Hong Kong – style Chinese; early modern Chinese;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责任编辑 郭庆华)